

在1938年开滦煤矿抗日大罢工斗争中，开滦赵各庄矿工人节振国与工友们一起英勇斗争，并在此之后的武装斗争中，打日军，除汉奸，极富传奇色彩，其事迹被广为传颂。

节振国于1910年10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今属河北省故城县），幼年随全家逃荒到开滦煤矿赵各庄矿，14岁下煤井当童工，后来在党组织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1938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中，节振国被推选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38年5月，当日军准备逮捕节振国时，他刀劈鬼子兵，逃出虎口。冀东抗日大暴动开始后，节振国组织矿工，在滦县韩家哨集结队伍，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李运昌部，被编为抗联李运昌部直属特务大队，任大队长。他指挥队伍攻占唐山赵各庄伪警所，扩大抗日队伍，将队伍拉出矿区，汇入农民暴动的洪流，经常出其

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日伪军闻风丧胆。1939年，节振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冀东抗联部队编入八路军后，他到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7月回到丰润、滦县、迁安等地作战，1940年8月1日，他率部夜袭赵各庄敌人军药库后撤到滦县下尤各庄，下午遭到日伪军围攻发生激战，不幸壮烈牺牲。

1940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听取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吴德的汇报，当汇报到开滦矿工出身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听了非常感兴趣，毛泽东得知节振国打仗勇敢、会武术、总是勇往直前时，毛泽东称赞并关怀节振国说：“这个同志很好，我们要注意保护培养，不然他会牺牲的。”但没等吴德把毛泽东对他的称赞与关怀向他传达，节振国就为国捐躯了。节振国牺牲后，周恩来在重庆曾指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关于节振国的作品，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撰写的节振国事

迹在《中国工人》刊物第九和第十期上连载，在解放区广为流传。

为纪念革命英烈，缅怀革命烈士，弘扬冀东革命斗争精神，唐山解放后，文艺工作者以开滦抗日罢工斗争和冀东军民抗日斗争事迹为题材，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赤胆忠心》、长篇小说《血染春秋》。在1949年初，冀东文工团的吴岚等便搜集素材，按照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达的指示到开滦赵各庄矿创作了歌剧《节振国》。1958年，唐山市京

运昌、刘汉生、李中权等先后观看了演出。1964年7月1日，唐山京剧团的演职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彭真的报告。彭真在1927年曾任唐山市委书记，他在报告中向演职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剧组人员倍感亲切，深受鼓舞。7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节振国》剧组的代表，使他们受到巨大的鼓舞。

京剧《节振国》在北京政协礼堂演出时，周文彬的妹妹观看了演出。周文彬同志在京剧《节振国》反映的这段历史中，曾是当时唐山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周文彬，原名金成镐，中国籍朝鲜人，生于

1908年，幼年随父亲侨居中国。1926年，他在通县路河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唐山工委书记，以修理收音机为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8年7月，在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中，他组织领导开滦赵各庄矿的工人抗日武装起义。之后，周文彬任中共冀东地委书记兼任丰滦迁联合县委书记，为冀东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10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冀热边行署和军分区在丰润县饭依寨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会后于10月17日转移到丰润县杨家铺村时遭到伪军的包围。全体干部战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周文彬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中共冀热边特委副秘书长李彬、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以及430多名干部战士。周文彬的妹妹由朝鲜来到中国，听说正在演出京剧《节振国》，特意去观看。剧情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使

在京首场演出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了演出。在京演出期间，朱德、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邓子恢、郭沫若、黄炎培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原在冀东工作过的老同志李楚离、李



京剧《节振国》剧照

她激动得泪流满面。演出结束后，她还到后台会见演职员并合影留念。

京剧《节振国》在京演出期间，不仅在首都舞台上，甚至在全国都引起轰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两篇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等都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剧本》月刊、《戏剧报》、《新华日报》也刊登文章和照片。14种报刊共刊登各类文章和照片46篇(幅)。节振国和冀东军民抗战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1964年6月5日，在北京民族宫剧场举行京剧观摩演出开幕式。唐山市京剧团团长李国昌入场后刚坐下，周恩来、陆定一等就到了。他们正好坐在李国昌后边。剧场内的人们看到周总理，全体鼓掌，一片沸腾。记者们围了上来拍照。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你们干什么？是看我还是看戏？他指示工作人员维持好秩序，不要影响大家看戏。李国昌当时很兴奋，又有些紧张，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面向周恩来总理微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问李国昌是哪个单位的。李国昌忙答：“唐山京剧团的。”周恩来略一思索说：“《节振国》？好！等着看你们的演出。”这场观摩演出结束时，周恩来健步走上主席台，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为大会

各代表团颁发纪念状。李国昌代表唐山市京剧团上台领取纪念状和总理握手时，又对周恩来说：“请总理看我们的戏。”周恩来看看李国昌说：“《节振国》，我要看。”后来，唐山市京剧团赴北京怀仁堂演出时，周恩来因病住院，没有看成。这不但是周恩来总理的遗憾，也是唐山市京剧团全体演职员和冀东人民的遗憾。

1964年9月，唐山市京剧团第二次进京演出。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去观看，其中也有康生。戏演到

第三场时，康生派人将带队的唐山市文化局局长罗楠、唐山市京剧团团长李国昌叫到了剧场会客室。康生面对罗楠、李国昌询问演员的政治情况和剧本创作过程，指责《节振国》剧正面人物的化妆有问题，党代表化了个印度胡子，腿上扎的像上海拉黄包车的等等。康生还讲道，他对开滦煤矿罢工情况有所了解等等。康生在指责的过程中，正巧中间休息的时间到了，朱德带着满脸笑容，健步走入剧场会客室。朱德高兴地对唐山带队的同志说“不错呀！好戏！”这时，罗楠、李国昌趁机问康生还有什么指示？康生回答说，我没看完，以后有意见让河北省委转达给你们。罗楠、李国昌乘这个机会退出了会客室。演出结束后，朱德亲切地接见了《节振国》剧组的全体演职员，并合影留念。

1964年夏季，《节振国》在各地连续演出3个月后，因为文化部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下达了拍摄《节振国》电影的任务，剧组于9月下旬赶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到长春后，剧组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剧本问题。在长春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原冀东区党委和唐山市委的老书记、当时担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于10月上旬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会见了唐山市京剧团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负责同志。吴德和唐山市京剧团团长李国昌、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胡苏、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等座谈至深夜。

吴德同志谈到，1938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当时他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被中共河北省委派到开滦煤矿，组织指挥罢工斗争，对这次罢工的情况非常了解。他谈到当时的斗争形势，既有工人同矿方资本家的矛盾，又有英日两国之间的矛盾。他详细讲述了节振国的事迹，还指示一定要拍好这部电影，并当场商定了几件事：一是胶片要争取用质量最好的；二是京剧搞现代戏，演员的演唱很重要，要选最好的演员；三是觉得拍摄班子的力量需要加强，商定又重新增加一套人马。经过紧张的工作，影片拍摄完成。中共吉林省首先审查样片，看后一致认为拍得、演得都令人满意。吴德看后，又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党的北方局，改为上级党组织；二是第五场胡志发给节振国宣讲形势时，加上“配合八路军挺进冀东”，因为这是时代背景和党的战略部署；三是戏结束时有一段台词：“我们的武装暴动胜利了，枪握在我们手上，用它打出一个新中国，创造一个新世界。”吴德同志提出在中间加上“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唐山京剧团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吴德提出的意见，对这三个地方进行了重拍。

1965年，电影《节振国》制作完毕，立即送北京审看。文化部几位部长看了样片很高兴，又速送中央审看。党中央很快批准在全国放映，并决定此片可以输出国外。文化部为此影片拍摄成功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唐山市京剧团分别发出贺电。

.....

1976年初，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观看电影《节振国》后，给予充分肯定，并指示重映，还指示北京京剧团也要排演这个戏。北京京剧团也曾派人来唐山学习京剧《节振国》，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件事被压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节振国》剧和电影才重新和观众见面。“文化大革命”后，唐山京剧团与北京京剧团联合演出了《节振国》，又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责任编辑：安熠辉